

《左传》神秘预言及其文献来源

刘子立

(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,北京 100875)

摘要:《左传》载录有大量极为灵验的神秘预言,其范围包括星占、梦占、卜筮、相人等各个方面,从理性与常识的立场来看,这些预言既不可能是实录,又不尽是左氏的附会,与《左传》中借助贤人君子凭借“德”、“礼”原则进行的预言源流不同。在《左传》之前,就已经产生了大量分类编纂的专书,《左传》作者广采当时文籍,并卜书及杂占书、纵横家、小说、讽谏等,这些神秘预言应当所来有自,可能出自当时流传的卜筮、杂占一类的术数类专书。

关键词:《左传》;神秘预言;术数类文献

中图分类号:G256

文献标志码:A

文章编号:1672-8580(2011)01-0118-05

关于《左传》中的各种预言,前人已经有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。本文也无意再作通论式的探讨,只是打算将其中尤为“怪力乱神”的一部分挑出,揣摩其特征源流,并对其文献渊源作初步的探讨。

《左传》中载录的预言很多,在整部书中当以百计。其预测当时直至百十年后之事,往往奇验,不得不令人生疑。但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,其中的许多预言,借助当时的贤人君子之口,根据“德”、“礼”等尺度预测人事,其内在理路,编纂过程都有迹可循。这一类预测的载录,应当与当时流传的《语》类文献有很大关系^①。其预言的应验,则是这一类文体的题中之义^②。不过,《左传》中还有一些预言,类似的原理并无法予以解释,其不可解的程度,也远远高于前者。其范围包括星占、梦占、卜筮、相人等各个方面。兹分门别类,各举一例,以观其大概旨趣。《昭公十年》:

十年春,王正月,有星出于婺女。郑裨灶言于子产曰:“七月戊子,晋君将死。今兹岁在颛顼之虚,姜氏、任氏实守其地。居其维首,而有妖星焉,告邑姜也。邑姜,晋之妣也。天以七纪。戊子,逢公以登,星斯于是乎出。吾是以讥之。”^{[1]1314-1315}

又《成公十六年》:

吕錡梦射月,中之,退入于泥。占之,曰:“姬姓,日也;异姓,月也,必楚王也。射而中之,退入于泥,亦必死矣。”及战,射共王中目。王召养由基,与之两矢,使射吕

錡,中项,伏弢。以一矢复命。^{[1]886-887}

又《僖公十五年》:

初,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,遇《归妹》三之《睽》三。史苏占之曰:“不吉。其繇曰:‘士刳羊,亦无亡也。女承筐,亦无貺也。西邻责言,不可偿也。《归妹》之《睽》,犹无相也。’《震》之《离》,亦《离》之《震》,为雷为火。为嬴败姬,车说问其輶,火焚其旗,不利行师,败于宗丘。《归妹》《睽》孤,寇张之弧,侄其从姑,六年其逋,逃归其国,而弃其家,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。”^{[1]363-365}

又《宣公四年》:

初,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,子文曰:“必杀之。是子也,熊虎之状,而豺狼之声,弗杀,必灭若敖氏矣。谚曰:‘狼子野心。’是乃狼也,其可畜乎?”^{[1]679}

类似的记载还有许多。《左传》中的这一类神秘预言,展示的完全是不可捉摸的事件,其中似乎也很少君子立言、道德训诫的气味,其旨趣与渊源,应该与前文所举的另一类预言有所差别。那么,其文献的来源又是什么?以下,就从几个方面加以梳理论证。

其一,出于理性与常识的立场,我们否认这一类事件的真实性。历代论者,常常将“是亦多言矣,岂或不信”(昭公十八年,子产语)^{[1]395}作为转圜的余地。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四“左氏不必尽信”就主张:“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,《左氏》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。”^{[2]369}徐复观先生亦认为:“史对于自己的判断没有

收稿日期:2010-09-03

作者简介:刘子立(1983-),男,福建厦门人,博士研究生,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。

效果的,人情上便未加记录。其因‘多言而中’的,在人情上便记录下来,不应怀疑是写《左传》的人追加的。”^{[13]141}“言巫,乃历史人物言巫;言人事,乃历史人物言人事,与左氏个人的是非好恶,毫不相干。”^{[13]163}然而,《左传》中的这类预言往往有时间跨度极长者,如《襄公三十年》:

于子蟠之卒也,将葬,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。过伯有氏,其门上生莠。子羽曰:“其莠犹在乎?”于是岁在降娄,降娄中而且。裨灶指之曰:“犹可以终岁,岁不及此次也已。”及其亡也,岁在颯訾之口。其明年乃及降娄。^{[1]1177-1178}

裨灶的预言,从预言到应验相隔了将近12年。很难设想,卜史们究竟如何一一检索、比对多年前的记录?这种行径,也未免太过欺心。又如前引宣公四年子文观越椒于襁褓,就不存在任何“多言而中”的余地。要言之,这些事迹太过神异,无论出于逻辑还是情理,都不大可能是当时的实录。

其二,这些预言是不是笼统出于左氏的自造^③? 这一观点,以杨伯峻先生《春秋左传注·前言》的论断最具代表性:“为什么全书所载卜筮,除偶然几次外,都是很灵验的?不能不使人怀疑,左传作者于其中有些添枝画叶。”^{[1]154}这些记载无疑是出自附会,但究竟出于谁的附会,却仍有可深究之处。首先,《左传》记载了春秋时期两百余年的史事,涉及预言之处触目皆是,所涉预言种类既多,又常常与事件的前因后果纠缠在一起,若说全部出自左氏的附会,工作量实在太过庞大。此外,凭空附会那么多事件、人名,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。其次,在《左传》所载录的预言中,就有采自己材料的痕迹。这一点,王和先生在《论〈左传〉预言》中有着详备的论述^[4]。其中确凿的例证,如《僖公五年》:

八月甲午,晋侯围上阳。问于卜偃曰:“吾其济乎?”对曰:“克之。”公曰:“何时?”对曰:“童谣云:‘丙之晨,龙尾伏辰,均服振振,取虢之旂。鹑之贄贄,天策焯,火中成军,虢公其奔。’其九月、十月之交乎。丙子旦,日在尾,月在策,鹑火中,必是时也。”冬十二月丙子朔,晋灭虢,虢公丑奔京师。^{[1]310-311}

晋灭虢是在“冬十二月丙子朔”,而卜偃预言却说是“九月、十月之交”。对此,王和先生论到:“很显然,冬十二月丙子朔是用周正,九月十月之交则是用夏正。‘十二月丙子朔’,估计原文本是‘十月丙子朔’,恰与‘九月十月之交’合……卜偃的话不好改,只有‘十二月丙子朔’是用周正改过的。这段文字记的是晋事,而晋

恰恰是用夏正。这就证明卜偃的预言不是出自左氏编造或后人增窜,而是取自晋国的史书。”^[4]是不是取自史书,笔者有不同的看法,下文还将论及。但以三正的差异判断史料的来源,应该是确凿无疑的。最后,《左传》所载录的预言,常常有着迥异的旨趣。如前文所引的相人术的例子,仅仅凭借初生婴儿的哭声就遽下判断,事实上否认了任何后天道德教化、修养的可能性,完全流于先天命运定论。这和《左传》中随处可见的以“德”、“礼”、“敬”等等观人的记载,宗旨上完全南辕北辙。如果出于左氏自造,就不当如是。

其三,如上所述,这些记载既不可能是实录,又不尽是左氏的附会,那么,其究竟源于何处?对此,笔者有一初步判断:《左传》中的神秘预言,很有可能来自当时流传的卜筮、杂占一类的术数类专书。唐代陆淳在《春秋集传纂例》中曾说:“(《左传》)广采当时文籍,故兼与子产、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,并卜书及杂占书、纵横家、小说、讽谏等杂在其中。”^{[5]3}《纂例》一书,历来被目为穿凿,然而这一论断,却是极具眼力的。要证明这一点,我们还需解决几个问题。

首先,在《左传》之前,除开《诗》、《书》等经典文献之外,有无编纂成册的专书?换言之,左氏所见的诸种史料,究竟是怎样的形态?《国语·楚语》载:

(庄王)问于申叔时,叔时曰:“教之《春秋》,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,以戒劝其心;教之《世》,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,以休惧其动;教之《诗》,而为之导广显德,以耀明其志;教之《礼》,使知上下之则;教之《乐》,以疏其秽而镇其浮;教之《令》,使访物官;教之《语》,使明其德,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;教之故《志》,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;教之《训典》,使知族类,行比义焉。”^{[6]485-486}

如若这一条材料可信,那么在《左传》之前,就已经产生了大量分类编纂的专书;左氏所见,并非是一锅粥式的原始材料。除开各国国史的正文之外,这一类专书恐怕是《左传》最重要的材料来源。而这些专书,也并非笼而统之,而是根据地域、时代、人物的不同,有了进一步的分类。《志》、《语》之名,只是统目而已。这一点,只要考察《左传》中关于子产、晏子的载录,就一目了然。其中有大量无法编年的《语》类文献,只好姑且通通放在某一年。顾颉刚曾论到:“《左传》中有许多条是必不可编年的,为了硬要编年,致成削足适履之病。这类文字也可抄出,如子产有疾一节,子产自病至死历一时期,太叔政宽至多盗又历一时期,至太叔政盗又历一时期,今皆记于昭二十年,即知其为不可编年之文而强为

之编年也。晏子事亦如此。”^{[17]206}这一类文献,最初应该是以人为目,分门别类进行收集的。其来源颇杂,实录与传闻兼而有之,然无疑在《左传》之前就已经初步写定^[8]。再考之《左传》中出现的《周志》、《郑志》、《仲虺之志》、《史佚之志》等等书名,这一论断当无疑。徐复观先生也指出“据‘史佚之志’的话,则史佚有专书,是可以相信的。”^{[13]145}就此而言,春秋时期文献发达的程度,很可能超乎今人的想象。

其次,《左传》中载录的神秘预言,是仅仅依附于《语》类文献中,还是别有专书?这一问题,也是本文立论的关键。从文献形态以及文体风格上,这一点已经殊难考证。先秦时期的术数类典籍,基本亡佚殆尽,而要确考编写于《左传》之前的,更是无迹可寻。而史苏、卜偃、梓慎、裨灶等人的遣辞用字,与一般的贤人君子并无分别。对此,笔者拟采取内证与外证参用的方法,以求其仿佛。

第一,在《左传》之前,这些材料可能就有专书。

《左传》中的神秘预言,自襄公末年以来,集中地反映在梓慎、裨灶二人身上。襄昭年间,凡是将要发生大事,往往能听见他们先见之明的声音。其材料之集中,以及在《左传》中的出现方式,都与晏子、叔向等人的载录方式很是类似。而这些记载,又大都涉及天象与人事的关系,如《襄公二十八年》:

二十八年春,无冰。梓慎曰:“今兹宋、郑其饥乎?岁在星纪,而淫于玄枵,以有时灾,阴不堪阳。蛇乘龙。龙,宋、郑之星也,宋、郑必饥。玄枵,虚中也。枵,耗名也。土虚而民耗,不饥何为?”……裨灶曰:“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。岁弃其次,而旅于明年之次,以害鸟帑。周、楚恶之。”^{[11]140-144}

岁星超辰,乃是正常不过的天象。梓慎与裨灶却借此发挥,各自做出了指向不同、却灵验如响的预言。这种记载,无疑不是实录;然而其中又涉及到专门之学,未必能以口耳的方式流传。以情理推断,梓慎、裨灶的事迹,在《左传》之前就有人进行了附会整理,而左氏再以编年的方式予以了载录。

第二,这些材料,不仅与贤人君子的“嘉言善语”大异其趣;在收录到《左传》之后,还与其他的《语》类文献发生了冲突。

仍以梓慎、裨灶为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:“数术者,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……春秋时鲁有梓慎,郑有裨灶。”^{[9]175}春秋时期,史卜的形象渐渐和君子合流,但梓慎、裨灶二人似乎是个特例。他们做出的预言,往往纯

然从天象、“望氛”^[4]等等得出,神秘色彩异常浓厚,而与贤人君子们做出的预言大异其趣,此其一。其二,《左传》中还记载了裨灶与子产的一次冲突。《昭公十七年》:

冬,有星孛于大辰,西及汉……郑裨灶言于子产曰:“宋、卫、陈、郑将同日火,若我用瓊罍玉瓚,郑必不火。”子产弗与。^{[11]1390-1392}

《昭公十八年》:

夏五月,火始昏见。丙子,风……戊寅,风甚。壬午,大甚。宋、卫、陈、郑皆火……裨灶曰:“不用吾言,郑又将火。”郑人请用之,子产不可。子大叔曰:“宝,以保民也。若有火,国几亡。可以救亡,子何爱焉?”子产曰:“天道远,人道迩,非所及也,何以知之?灶焉知天道?是亦多言矣,岂不或信?”遂不与,亦不复火。^{[11]1394-1395}

这一则材料在《左传》中脍炙人口,凡论预言者无不称引。通行的看法是,这反映了当时理性思潮的抬头。此固然不差,然而考之《昭公九年》:

夏四月,陈灾。郑裨灶曰:“五年,陈将复封。封五十二年而遂亡。”子产问其故,对曰:“陈,水属也;火,水妃也,而楚所相也。今火出而火陈,逐楚而建陈也。妃以五成,故曰五年。岁五及鹑火,而后陈卒亡,楚克有之,天之道也,故曰五十二年。”^{[11]1310}

又《昭公十年》:

十年春,王正月,有星出于婺女。郑裨灶言于子产曰:“七月戊子,晋君将死。今兹岁在颛顼之虚,姜氏、任氏实守其地。居其维首,而有妖星焉,告邑姜也。邑姜,晋之妣也。天以七纪。戊子,逢公以登,星斯于是乎出。吾是以讥之。”^{[11]1314-1315}

若论神异程度,后两条记载恐怕还要更甚一些,然而子产却没有任何“天道远,人道迩”或者“灶焉知天道”的评论,而是虚心地问其故。数年之内,子产的态度何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?无论如何为之弥缝,这都难以说通。最合情理的解释就是,这两组材料,虽然都提到了裨灶与子产,然而文献的来源却不相同:前者来自以子产为主角的语类文献,后者则来自以裨灶为主角的术数类文献;前者宣扬君子的智慧修养,后者鼓吹星占的神奇灵验。二人分别担当了一次对方的陪衬。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梓慎身上。《昭公二十一年》:

秋七月壬午朔,日有食之。公问于梓慎曰:“是何物也,祸福何为?”对曰:“二至、二分,日有食之,不为灾。日月之行也,分,同道也;至,相过也。其他月则为灾,阳不克也,故常为水。”^{[11]1426-1427}

而《昭公二十四年》:

夏五月乙未朔,日有食之。梓慎曰:“将水。”昭子曰:“旱也。日过分而阳犹不克,克必甚,能无旱乎?阳不克莫,将积聚也。”^{[10]451}

同理,若是出于同源的文献,断无日食一主水,一主旱的道理。在昭公二十四年的记载中,梓慎只不过是叔孙昭子的陪衬。只不过这两则文献的对比,不如前文所引的那么强烈而已。综上所述,这种冲突,恰好证明了两种文献的不同源,梓慎、裨灶之流的事迹,很可能是记载于天文、五行或者杂占一类的专书中^⑤。

第三,就春秋以及战国早期的思想特征而言,也很可能有术数类的专书。

先秦时期的术数类典籍,基本亡佚殆尽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术数略的著录,由于年代难考,且基本偏晚,亦难以为凭。幸好《晋书》卷五十一《束皙传》中还保存了一些战国书籍流传的情况:

初,太康二年,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,或言安釐王冢,得竹书数十车。其《纪年》十三篇,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,以事接之,三家分,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……其《易经》二篇,与《周易》上下经同。《易繇阴阳卦》二篇,与《周易》略同,《繇辞》则异。《卦下易经》一篇,似《说卦》而异。《公孙段》二篇,公孙段与邵陟论《易》。《国语》三篇,言楚、晋事。《名》三篇,似《礼记》,又似《尔雅》、《论语》。《师春》一篇,书《左传》诸卜筮,“师春”似是造书者姓名也。《琐语》十一篇,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。《梁丘藏》一篇,先叙魏之世数,次言丘藏金玉事。《缴书》二篇,论弋射法。《生封》一篇,帝王所封。《大历》二篇,邹子谈天类也。《穆天子传》五篇,言周穆王游行四海,见帝台、西王母。《图诗》一篇,画赞之属也。又杂书十九篇:《周食田法》,《周书》,《论楚事》,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》。^{[10]1432-1433}

魏襄王与魏安釐王的时代虽属战国晚期,但墓中所藏的竹书当有许多是早于这一时期的。值得注意的有两点。其一,汲冢竹书中的术数类图书占了很大比重,有八篇之多,足可见这一类图书在当时的盛行。若说无本无源,自战国末年方勃然而兴,似乎悖于思想史的一般规律。其二,竹书中有《师春》一篇,“书《左传》诸卜筮”。这一篇文献,在杜预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》中也有提及,认为“纯集疏《左氏传》卜筮事”。然而,记载相同未必就是照抄,两者也可能有相同的文献来源。类似的例子如《左传》与《国语》,《左传》与《晏子春秋》的关系,都未可一概而论。退而言之,亦足可见《左传》

的卜筮为后人所重视,前人观史、修史的趣味未必与我们一致^⑥。卜筮的历史源远流长,类似《师春》这样的记载卜筮事例的书,既是卜筮者职业的必备,也足以作为风闻的谈资。其与《左传》形成互补的关系,并非没有可能。饶有趣味的是,这一编纂方法,也是后世史书所常见的。如历代史书多有《五行志》,《后汉书》有《方术列传》、《晋书》多采《世说新语》,都反映了史官类似的趣味,正所谓先圣后圣,其揆一也。

基于以上几点分析,笔者对《左传》中神秘预言的文献源头,进行了大致的判断。《左传》中的预言,时常趣味不一,宗旨各异。最通行的观点是,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杂糅的特质。然而窃以为,在尚不能确定文献来源与性质的前提下,如何能够轻易判定当时社会的情伪?一些看似尖锐矛盾的冲突,或者人物前后言行的抵牾,有可能只是源于文献的来源与性质不同,如上文所举的裨灶与子产之事,便是一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些揣测之辞,或有助于揭橥另一种阐释《左传》文本的可能性。

注释:

①参见赵光贤《〈左传〉编纂考》,《古史考辨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7年版;王和《〈左传〉材料来源考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1993年第2期。

②过常宝在《先秦散文研究——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》(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,第195页)中指出:“立言风尚所带动的言语载录之风,使得君子之‘语’可能成为一种供后人揣摩理解的独立文本,它由于不具有神圣的或制度性的权威,所以必须依托事实才能获得理解,在这种情况下,‘语’往往要依傍事实”堪称的论。选择性的编撰,以道德因果律为根据的依附,可视为其应验的根本原因。

③关于《左传》的作者,学界多有争论,此处不能详及。为了行文方便,姑且以“左氏”代指《左传》编撰者。

④《昭公二十年》:二十年春,王二月己丑,日南至。梓慎望氛曰:“今兹宋有乱,国几亡,三年而后弭。蔡有大丧。”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0年版,第1406-1407页。

⑤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事实上,卜筮最神异、最灵异的例子还在于《庄公三十一年》:初,懿氏卜妻敬仲。其妻占之,曰:“吉。是谓‘凤皇于飞,和鸣锵锵。有妣之后,将育于姜。五世其昌,并于正卿。八世之后,莫之与京。’”和《闵公元年》初,毕万筮仕于晋,遇《屯》之《比》。辛廖占之,曰:“吉。《屯》固、《比》入,吉孰大焉?其必蕃昌。《震》为土,车从马,足居之,兄长之,母覆之,众归之,六体不易,合而能固,安而能杀,公侯之卦

也。公侯之子孙,必复其始。”不过这两个例子故作讖纬的气味太浓,故行文中一直存而不论。这一类的卜筮,可能是左氏另外附会的,也有可能就收在卜筮类的专书中——如果以“自神其事”的目的而论,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。

⑥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文》卷十五辑录二则,其中的一则上有这样的记载:周穆王姜后,昼寝而孕,越姬嬖,窃而育之,毙以玄鸟二七,涂以麋血,置诸姜后,遽以告王。王恐,发书而占之,曰:“蜉蝣之羽,飞集于户。鸿之戾止,弟弗克理。重灵降诛,尚复其所。”问左史氏,史豹曰:“虫飞集户,是曰失所。惟彼小人,弗克以育君子。”史良曰:“是谓关亲,将留其身,归于母氏,而后获宁。册而藏之,厥休将振。”王与令尹册而藏之于椟。居三月,越姬死,七日而复,言其情曰:“先君怒予甚,曰:‘尔夷隶也,胡窃君之子,不归母氏?将置而大戮,及王子于治。’”严可均辑本乃据李善《文选·思玄赋注》,而明代梅鼎祚《文纪》引此段作汲冢《师春》。未知是否可据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杨伯峻.春秋左传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0.
- [2] 顾炎武,撰.黄汝成,集释.日知录集释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.
- [3] 徐复观.两汉思想史:第3卷[M].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.
- [4] 王和.论《左传》预言[J].史学月刊,1986,(4):15-20.
- [5] 唐陆淳.春秋啖赵集传纂例:丛书集成初编[G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6] 徐元诰.国语集解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2.
- [7] 顾颉刚.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[M].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8.
- [8] 王绪霞.《晏子春秋》成书考论[D].西北师范大学,2006.
- [9] 班固.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10] 房玄龄.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
责任编辑:梁雁

Mysterious Prophecies and Literature Sources of *Zuo Zhuan*

LIU Zi-li

(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, Beijing 100875, China)

Abstract: There are enormous of mystical prediction in *Zuo Zhuan*, including horoscopy, oneiromancy, divination, face reading and so on. From the standpoint of reason and common sense, *Zuo Zhuan* contained a lot of mysterious prophecies of divining, neither is the Record, it is not all excursus by the writer of *Zuo Zhuan*, the prediction origin in this part of the material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inciple about “morality” and “courtesy” of gentleman in *Zuo Zhuan*. A conjecture is that it may come from Shushu specific books on Divination.

Key words: *Zuo Zhuan*; mystic prediction; shushu documents